

纳粹大屠杀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影响

李红梅

(榆林学院 政史系,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从1933年到1945年的十几年里,纳粹对犹太民族的迫害、驱赶和“最后解决”,约使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爪中,是全部犹太人的1/3,这不仅让犹太民族遭遇灭顶之灾,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但大屠杀并未能摧毁犹太民族的奋斗精神,反而使犹太民族得到世人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使犹太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反犹主义;纳粹;大屠杀;影响;犹太民族;犹太文明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09-0110-03

西欧从19世纪开始的反犹主义,经过20世纪初俄国和东欧反犹者再次恶性膨胀,到20世纪20年代表现出显著的反犹新特点,即在继承以往反犹理论中的种族歧视、宗教偏见等老一套货色后,将反犹与反共相结合。这也使20年代的反犹运动向当时欧洲右翼极端势力靠拢,最终不可避免地与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酝酿成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反犹运动直至大屠杀。

从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里,这场运动从没间断过,而且逐渐升级。即1933年至1938年主要在德国本土颁布一系列反犹法案,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自上而下、无孔不入的迫害;从1938年到1941年,随着德国吞并和占领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纳粹的反犹政策和法令照搬到德占领地区,并发展为驱赶和隔离相结合的行动方针;从1941年到1945年,纳粹当局转而实行“最后解决”政策,即从肉体上消灭整个犹太民族。

纳粹的迫害、驱赶和“最后解决”究竟使多少犹太人丧生?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约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中。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约有1800万犹太人,其中1200万生活在欧洲。这就是说,希特勒“消灭”了全部犹太人的1/3,欧洲犹太人的50%!这不仅是犹太民族遭遇的灭顶之灾,而且也是人类历史罕见的大悲剧。纳粹大屠杀对整个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大屠杀摧毁了欧洲犹太社区,结束了犹太史上的“欧洲中心”时期,使犹太文明主要舞台转移到美国和巴勒斯坦

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的国家的犹太社团都在大屠杀中遭受灭顶之灾,有些国家的犹太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如波兰300万犹太人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不复存在。德国境内那时也很难看到犹太人。早在纳粹开始反犹运动之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便开始逃离欧洲,即使在战时,这股“逃离欧洲”的潮流也没有停止。到了战后,为数不多的犹太幸存者自然也不愿再生活在这块令他们遭受无尽苦难的土地上,纷纷移居欧洲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北美和巴勒斯坦。战前欧洲犹太人占全球人口总数的2/3,但到战后初期,如不把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算在内,欧洲犹太人数量已不及全球犹太人总数的10%。可以说,由于大屠杀所引起的犹太人口大迁移,长达1000多年的犹太民族主体生活在欧洲的时期已经结束。欧洲作为犹太精神文明中心地位也已不复存在。当时,北美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

量已占全球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到5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已上升到70%左右。显然,犹太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和犹太文明的主要舞台已逐渐移到北美和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一转移意味着:犹太民族的发展,犹太文明的复兴,犹太国家的重建和振兴,将越来越取决于北美和巴勒斯坦的事态发展和历史演进。

第二,大屠杀使犹太人为生存而互相支持,团结拼搏,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促使“锡安主义”再掀高潮,客观上为犹太民族国家重建和犹太文明复兴注入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当希特勒在欧洲掀起反犹狂潮之时,犹太世界的第一反应就是全力救助欧洲受难同胞,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美国犹太社团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早在1933年,一些锡安主义领导人就与纳粹德国经济部达成秘密协议,商定让德国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这些人可将资产存入德国的一个特别帐号,用来为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购进这些商品的巴勒斯坦商人再掏钱补偿德国犹太移民的损失。^[1]该协议在锡安主义组织内部遭到了强烈反对,但它毕竟使不少德国犹太人得以在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前离开纳粹德国前往巴勒斯坦,还使他们能保留一部分财产作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安家费。就锡安主义运动而言,营救欧洲犹太人的重要目的在于组织他们移居巴勒斯坦。不过,巴勒斯坦接纳外来移民的容量毕竟有限,特别是在阿犹冲突日益激化和英国当局不断加强限制的情况下,移民巴勒斯坦也十分困难。到1939年“5.17”白皮书发表后,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人办事处不得不转而采取“非法”手段将欧洲犹太难民偷运到巴勒斯坦。

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不同,世界各犹太社团组织展开营救行动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帮助犹太人离开纳粹欧洲去任何愿意接纳他们的地方,而不是一定要 go 巴勒斯坦,他们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建立临时办事处,以提供资助的方式帮助犹太难民获得离境许可证,再获得某国的入境或过境签证。到战争爆发后,他们又建立了许多地下通道,将一批批犹太难民转移出纳粹占领区。对于在一些国家滞留或已被发现暂时栖息地的难民,他们千方百计给予帮助,使之能度过战时的最困难时期。

遭受劫难的欧洲犹太人也并非只是坐等外援或束手待毙,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各种方式抵制纳粹的暴行。不过,在最初的几年里,突如其来的反犹狂潮使他们不知所措,最普遍的反抗方式只有两种:逃离和自杀。到格林斯潘暗杀赖特

事件发生,标志着犹太人忍无可忍,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抵抗。战争爆发后,大批犹太人参加盟军和游击队,走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线。据统计,有168.5万犹太人参加了美国、英国、苏联、波兰、法国的军队及各地的游击队,如按希特勒的犹太人定义(三代中有一个是犹太人的均为犹太人),这个数字可能会高达300万。同时,还有许多犹太人积极参加了地下斗争,奋战在秘密战场上。为盟军收集情报,建立秘密交通线,破坏德军设施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处在隔离区和集中营内的犹太人虽然吃少穿少,身体虚弱,手无寸铁,却依然宁死不屈,组织起来发动起义和暴动,打击了纳粹及其帮凶的气焰,在人类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仅在东欧,就有20个隔离区和5个集中营爆发了中等以上规模的起义。^[2]

纳粹大屠杀从肉体上消灭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但却从精神上促使了犹太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当所有的犹太人都为民族的生存而殊死拼搏之时,所有内部的矛盾都显得无关紧要了。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政策使欧洲不再是犹太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苏联人等等,而仅仅是犹太人,从而使许多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既然同化程度如此深的犹太人都无法生存下去,那其它国家的犹太人还有什么希望。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去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这是绝大多数犹太人从大屠杀中悟出的一条道理。德国犹太裔化学家弗里茨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在24岁时就改信了基督教,由于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研制出化学武器而被任命为重要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但纳粹上台后照样受到迫害,被迫辞职。他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到:“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个犹太人”。

第三,大屠杀震撼了全人类,使全球范围同情和协助犹太人支持锡安主义的潮流急剧高涨,从而为以色列建国及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复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机遇

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和屠杀,各国政府起初只是在口头上加以谴责,并不愿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救助犹太人。1938年7月,在法国举行了专门讨论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有32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会上每个发言人都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表示同情,但除多米尼加外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1938年英国发表的“5.17白皮书”实际上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巴勒斯坦的大门。拥有庞大犹太社区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入境加以种种限制:1939年5月,美国政府将载有900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船拒之门外;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1941年,美国国会又拒绝了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

尽管各国政府的态度令人失望,但各国广大民众、社团组织、慈善机构乃至不少中下级官员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表示出深切的同情,并想方设法救助他们。国际红十字会及各国的红十字会一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难民,特别在战争状态下,由于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仍然进入交战双方控制的地区,因而他们在营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难民方面往往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基督教会历来对犹太人抱有宗教偏见,但是,当纳粹反犹暴行愈演愈烈之时,许多主教和教士公开站出来声援犹太人。在法国、荷兰、比利时,教堂往往是

隐藏和保护犹太人的有利场所。战争爆发后,活跃在各地的游击队也都积极参加营救犹太人的行动。

不仅在欧洲,在北美、东亚、澳洲、拉丁美洲甚至南非等地,正义之士也都纷纷挺身而出,声援和求救犹太人。如在中国,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早在1933年就向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强烈谴责希特勒的反犹暴行。上海,这座同样也遭到战火摧残的东方大都市,从1933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共接纳了欧洲犹太难民近3万人,除去部分人后来又离开上海去第三国,仍有2.5万人一直留在上海直至战争结束。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西蒙·维森塔尔指出,当时上海一市接受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受难民数的总和还多。拉丁美洲小国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等也都接纳了相当数量的犹太难民。

战后,以色列议会曾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以色列政府代表犹太人民感谢所有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或非犹太家庭,并授予他们勋章和奖励。截止1990年5月1日,总共有8611人因此项法令而接受了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勋章和奖励。虽然他们可能只是当年救助过犹太人的成千上万非犹太人中的一小部分,但这足以显示当时非犹太世界对纳粹暴行的反抗和对犹太民族的支援是多么强烈。

随着广大民众声援犹太人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特别当纳粹“最后解决”的真相于1942年通过瑞士传达到西方之时,各大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更加强烈地谴责纳粹暴行的同时,也感觉到应该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然而,一些早几年可以采取的行动在战争状态下已难以做到。到战争的最后阶段,除了加速进军外已没有什么另外办法可以拯救死亡营中的犹太人。1945年春,随着盟军解放一个又一个集中营,纳粹大屠杀触目惊心的后果终于暴露在全人类面前,使世界为之震惊。全球范围同情犹太人今进而支持锡安运动的潮流迅速高涨,形成难以阻挡之势。

在此前后,在这样一种同情犹太人的大气候中,各大国政府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均发生质的变化。即从一般同情犹太民族转变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4年10月公开宣称“我知道犹太人曾经在多么长的时间内多么热切地争取并祈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共和国。我相信美国人民支持这个目标。如果我再次当选,我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后来继罗斯福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方针。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一直谴责锡安主义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从1928年起在国内禁止锡安主义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也有变化。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万斯基于1943年访问巴勒斯坦,与犹太代办处和锡安主义领导人进行会谈。战争后期苏联宣传机器猛烈抨击纳粹的屠犹暴行,而对锡安主义的批评已不多见。1947年5月14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发言。他用了大量时间来追述犹太人民遭受的“非常的不幸和苦难”,并且正式表态支持“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4]这是苏联第一次明确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国家。一句话,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渐渐消散之时,世界各国都难以否定这样一个要求:为成千上万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找到一块安身之地,为

中华建筑美学思想源头探析

——对陕西古建筑的解读

祁嘉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中文系教授, 西安 710054)

[摘要]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陕西古建筑的历史发展, 我们不难发现陕西在中华建筑美学思想的产生与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不管是得山水而美的风水思想, 还是以大为美的追求, 或是营造意境之美的匠心, 这些足以构成中华建筑美学思想核心的内容, 都最早在陕西古建筑上萌芽和发展, 并得到了长久的保存。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陕西古建筑视为中华建筑美学思想的源头。

[关键词]陕西古建筑; 审美视角; 价值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09-0112-03

(一)

置身于中华审美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传统建筑的历史发展, 追寻建筑美学思想的源头与流变, 我们便不难发现陕西在这一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不管是半坡先民在浐河岸边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的半地穴式房屋群, 还是周王朝祖先在岐山脚下建造的规模宏大的大型庭院遗址, 再到号称始皇帝建造的那座“履压三百余里, 隔离天日”的秦阿房宫, 在地址选择、样式结构、设计思路方面表现出来的审美追求, 经过漫长的岁月, 在这块土地上孕育、萌生, 从幼稚走向成熟, 经汉唐盛世达到了顶峰。研究陕西古建筑, 我们不但可以从梳理出中华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 还可以看到凝聚其中的

饱受苦难的犹太人建立一个他们能在其中安全生存的家园。如果没有一个国家(美国和苏联)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支持他们在巴勒斯坦重建国家也许就是唯一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纳粹本想要将犹太人逐出世界民族之林, 但结果却使人类社会认识到: 必须尽快使犹太民族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一席之地。

第四, 大屠杀在犹太民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和烙印, 对犹太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为犹太民族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留下了永存的反面教材

1945年5月, 当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巴勒斯坦、美国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区时, 人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升起了镶有黑边的旗帜, 以悼念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同胞。随着有关大屠杀的细节和内幕越来越多地被披露, 每个犹太家庭都发现有亲人或朋友在这场大劫中丧命。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 可以想象在他们同胞的灵魂深处留下了多么刻骨铭心的创伤。以色列政府于1951年通过法令确定犹太历尼散月(大约在公历4月)27日为大屠杀纪念日。现在每到这一天, 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要点燃蜡烛, 以纪念1933—1945年期间惨遭纳粹杀害的600万兄弟姐妹。大屠杀期间许多其它悲剧性事件发生的日子, 现在也成了缅怀大屠杀难民的纪念日。每年11月9日, 人们都要纪念1938年那个“玻璃破碎之夜”的受害者。许多人那天会到德国犹太人的碑前献上一束花。到

传统建筑文化的基本精神, 探寻到中华建筑美学思想的源头活水。

这无疑是将陕西古建筑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学术视点。

(二)

我们先从传统建筑选择地址上看。我们的祖先十分重视地形地貌、山水距离、采光通气等环境因素, 并有“地之美者, 则神灵安, 子孙昌盛, 若培植其根而树叶茂”的说法, 认为建筑环境的好坏, 不但关系到居住者自身的安危, 而且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兴衰, 甚至连种植在建筑内外的花草树木都要受到影响。显然, 在古人眼里, 建筑环境比建筑本身还重要。环境好了, 居住其中才可能健康长寿, 子孙满堂; 反之, 环境不好, 会影响人的身心健

了4月19日及其后几天,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举行仪式纪念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的勇士们。1983年纪念起义50周年之时, 在华沙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同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主持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开馆仪式,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屠杀纪念馆是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建立的。

大屠杀这场浩劫也在犹太文化思想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半个世纪以来, 出现了许许多多反映大屠杀的小说、电影、戏剧, 其中大多数虽由犹太作家和艺术家所创作, 不但在犹太人中受到欢迎, 也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中国人民来说也不陌生。如《华沙一条街》、《美丽人生》、《苦海人生》、《大屠杀》等作品都曾震撼了具有良知的人们的心灵, 说明大屠杀这个悲惨事件已成为犹太文学艺术乃至世界文学艺术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参考文献:

[1] 伊萨克·科奥斯基(I SSAC KOWALSKI). 犹太人抵抗运动文选1939—1945(ANTHOLOGY ON JEW SH ARMED RESISTANCE 1939—1945)[M]. 商务出版社, 1984.

[2] 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 犹太历史地图集(ATLAS OF JEWISH HISTORY)[M]. 北大出版社, 1933.

[3] 格罗勃曼和兰迪斯. 大屠杀研究论集[M]. 商务出版社, 1984.

[4] 国际关系研究所. 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M].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责任编辑: 黎峰]